

女性“负向自认”的类型分析

宋新军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社会的成见与刻板印象与女性自身的“负向自认”,是女性真正解放路途中的一个悖论。女性的负向自认,包括“原发性”与“借助式”两大类型。前者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是由女性“社会性别”的弱势地位所决定;后者即可借助异性,也可借助同性,因而更具有女性自我心理补偿的学术价值。改变这种不利于女性解放与成长的负向自认,既需要整个社会参与,也需要女性自身努力。女性自觉性的不断提升,是女性全面解放的必要途径。

关键词:女性;负向自认;原发性;借助式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3-0052-05

美国作家菲莉斯·切斯勒写了一本颇具影响的书《女性的负面》,用不无偏激的语言,尽数女性在同性之间的妒忌、猜疑、排挤。该书用“负面”作总题,辞锋犀利地写出了对女性自身的负面评价。“女人真是性别歧视者吗?我们当然是。最近对五大洲19个国家1.5万人进行的调查发现,女人就像男人一样持有男性至上的观点。”最近对500名英国女性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女人认为,在特定的环境下,家庭暴力是可以接受的;一半以上的女人认为,与凶残的配偶断绝关系是错误的。我们并不完全否定作者在调查时的某种既定观念上的倾向性,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种调查结果所反映出的女性自身的负向评价,即女性对女性自我负向评价的事实存在。

如果我们坦诚地将女性自我的负向评价,既认定是一个使自我形象受到扭曲的新的“镜像”,也认定这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必然的”社会存在,并且成为女性自觉意识赖以提升的障碍和瓶颈的话,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进而探讨女性负向自认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哪些是常态的,也称“原发性负向自认”;哪些是非常态的,也称“借助式负向自认”。

一、原发性负向自认

“原发性负向自认”,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话题。什么是原发式的负向自认?为什么会产生原发式的负向自认?除了社会、文化的原因之外,女性自身的负向评价其深沉的自我认识基础是什么?如果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原始思维的生殖崇拜在倾向上是无所谓男、无所谓女的。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远古时期的文化遗存,可以印证这一点。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在倾向上无所谓男、无所谓女的生殖崇拜,也是以男性的视阈为出发点,抑或说远古时期的这些文化遗存,创作者主要是男性,观看与膜拜者也主要是男性。于是,经过漫长历史积淀下来的社会规约,便决定了两性不同的性文化和性观念,女性把自己的性欲望和性器官看作是肮脏的、不好的;而男性对自己的性能力和性器官的感受却恰恰相反。这就造成了“两性的性规范不仅不同,而且女性的性是紧密地与男性的评价联系在一起,对于女性的性的好坏、珍贵与否等评价都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做出的,女性的性不依附于女性,而依赖于男性。”^{[1]197-198}作为社会性别论的探讨,可以认为,“性观念的不平等”应该是基础性的不平等。正是由于基础性的不平等,才造成女性深层心理上

收稿日期:2010-05-10

作者简介:宋新军(1959-),女,河南卫辉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化伦理学。

的不平等,才是女性负向自认的源头。

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女性的负向自认来自于何时?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一切根源都可以从经济基础这一根本动因中寻找答案的观点分析,女性社会性别的弱势地位来自于此,女性负向自认的最根本源头也来自于此。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在于,由采集向狩猎生产方式的转化,使得以体力见长的男性,其社会地位逐渐超出女性,成为“社会性别”观念的滥觞。但这一转变只能说明部分问题,而不能说明全部。比如由群婚制向配偶婚制的转化,其主要动因,除上述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之外,还会有其它一系列内、外在因素,促使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这中间的诸多原因,随着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新发现,还会有新的拓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早在七千年前的仰韶半坡村遗址,仍然是母系氏族的后期或父系氏族的初期之标志。这种状况可以延续到五、六千年前,华夏文明肇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父系制度占统治地位的肇始。

这种时间的回溯,无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由初民“女权”制向中、近古“父权”制的嬗递,如放置于历史的长河里来看,也是一个人类发展的过渡,而“平权”制才是社会性别在和谐格局下的真正归宿。让我们再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将成为适应这一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这一视阈来分析,女性主体的“负向自认”,也就在所难免。美国心理学家卡甘和莫斯(Kagan & Moss, 1962)在《从出生到成人》一书中,介绍了他们对个性发展进行的一项重要的跟踪研究。他们曾对一组被试者从6岁追踪到20多岁。对观察记录的分析表明:学龄初期有侵犯行为的男孩成年后仍然有这样的行为,而学龄初期有过侵犯行为的女孩到成年以后却不再有侵犯行为:在学龄初期有明显依赖行为的女孩,到成年以后仍然有明显的依赖倾向,而在学龄初期有依赖倾向的男孩,到成年期却不再具有依赖倾向。卡甘和莫斯认为,这说明男女行为方式和个性的保持似乎与社会性别角色的期望标准有密切关系。因为社会允许男性具有较多的侵犯性,而不允许女性有这种侵犯性;社会认为女性具有依赖性这是理所当

然的,而男性则不应当具有依赖性。因此,她们认为每一个人将社会性别角色标准内化,就是性别角色的社会化^[2]。这种“性别标准内化”,也称为“性别标准自然化”,是通过惯习的作用而实现的。惯习(habitus),有时候也译作习性,它有别于习惯的概念(habit)。一般来说,习惯偏重于机械性反应的含义,而且往往用于个体层面。惯习强调一种持续的、可转化的性情倾向系统。它是社会的一整套系统,它整合了个人的经验,是个人的知识系统以及对世界的感知。从个人角度而言,个人从无数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慢慢学习和累积主体经验,形成“社会天性”(第二本性)。因为社会成员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内化惯习的过程,人们在惯习中确定自身性别行为的依据,获得社会肯定。由于惯习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得到复制,并且再现和复制惯习的人数庞大,成为主流,以至于人们常常把惯习视为是“自然的”,所谓的天经地义就是指惯习的“自然性”。优势团体的习惯一旦成为惯习,那么,对弱势团体而言,即使这种惯习是有害的,也必须得到执行和贯彻。从性别角度来看,在大部分的文化中,男性都是占优势的团体,因此,男性统治的概念,存在于社会成员内化的状态中,成为能动者的惯习。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女性团体,通过惯习,女性共同实践男性统治的世界观。这样,男性的惯习就成为所有人的惯习,成为社会的唯一的惯习^{[1]279-281}。女性的“负向自认”,就是这种“惯习”的作用,使女性主体意识的弱化,乃至泯灭,并“自然化”地成为男性话语的代言人。区别的是,男性凭藉其社会先天优势,不需要通过“自认”或“正向自认”的方式来达到自我确证,而女性则需要通过“自认”或“负向自认”的方式,才能达到与外界保持心理平衡的自我确证。从而形成一种被“自然化”了的原发式的负向自认。

这种原发式的负向自认,从古至今延续了数千年,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描写。比如英国杰出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当新婚之夜丈夫克莱交待自己有过婚前性行为求她原谅时,她也袒露了自己曾被人强奸的“罪过”,并可怜巴巴地对克莱说:“你也原谅了我吧,我的过错正和你的一样呢!”然而,她却遭到了抛弃。鲁迅的名篇《祝福》

里的祥林嫂也是如此。当她死了第一个丈夫祥林,而到鲁四老爷家做帮佣时,脸色还红润;死了第二个丈夫贺老六,第二次返回鲁四老爷家时,脸色已苍白。特别是接二连三地鲁镇的村民叙说以“我真傻,真的……”开头的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的惨剧时,村民们先是流泪、同情,后是面无表情,再后是无趣走开。甚至认为唠叨的祥林嫂已经疯了。过去我们的教科书也这样说。其实鲁迅的原意不是这样。祥林嫂之所以反复叙说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的“真相”,是想向公众解释阐明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的死因与她无关!可怜的祥林嫂已经“克”死了两个丈夫,她是万万不能再“克”死自己儿子的!换一句话说,第二次返回鲁镇的祥林嫂,她的丧父失子之痛,远没有封建伦理道德的“克”夫“克”子的自我谴责、自我恐惧更让这位无辜的妇女痛悔万分!她临死之前向“我”发问“人死后有没有地狱?”就是明证。可见女性负向自认,有着多么根深蒂固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

二、借助式负向自认

“借助式负向自认”,是在原发式负向自认的基础上,继续延伸为必须借助“他者”来间接地实现自己的负向自认。

首先是借助异性。即通过向异性直接或间接的皈依,来实现其负向自认。作为漫长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积淀,女性深染其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男性的目光当作自己的目光、将男性的判断当作自己的判断。对同一背景下的男性予以较高评价、女性以较低评价——这一点在男性中间,表现不甚明显。前面我们曾讨论过对男女性的成败归因,对女性的成功,多强调客观原因;对女性的失败,多强调主观原因。对男性的评价则恰好相反。而作为这种不无明显男尊女卑倾向性的评价主体,往往是女性。

夫荣妻贵,这样一种潜在的群体意识,在中国“家国”观念壁垒森严的传统文化背景下,表现得非常典型。其实西方文化传统中,也有这种以自我意识丧失为代价的负向自认现象。“如果女人以某位男人或妻子或女儿的身份进入传统的女性交际圈,她会在其他妻子和女儿中,摆出她丈夫或她父亲的架子。等级观念非常盛行。”^{[3]357}再比如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商品,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男

性主动选择他所喜欢的商品,而女性则被邀请选择使得自己可以更好地讨好他人的商品。”^[4]常言道:“女为悦己者容”,其“悦己者”主要就是指男性。“早在公元前200年就有美容化妆品的专著告诉女人如何通过化妆来吸引男人,并建议还可以用文身和染发及牙齿来使脸孔显得更加美丽。而现代,美国贝拉明大学的心理学家唐·奥斯本做过一项试验,他给50名男性评定人看一些上妆和未上妆的妇女照片。结果表明,在未上妆妇女的照片中,无论提供的女人照片多么好看,都大大降低了对她的魅力评价。”^[5]包括服饰的选择都有这种潜在的心理动因。这恰恰说明女性在无形的借助式负向自认当中,对某种行为的补偿。如果从大多女性并不喜欢化了妆的男性这点来看,也可从反面印证这一观点。

其次是借助同性。即通过对同性直接或间接的贬低,来实现其负向自认。这一方面是女性负向自认的最重要内容。从表面看,女性对同性表现得更为挑剔,甚至“疾恶如仇”。而事实上,此“恶”是否真恶?此“仇”是否成立?在这样一些深层次的判断上,女性往往表现得比男性更为偏激。我们仍以文学作品为例。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长篇小说《红字》中,塑造的主人公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因为有个私生子而去请罪。那位男长官判决白兰在胸前挂上一个A字。然而,作品中的女人们都觉这种判决太宽大了。“‘太太’,一位长相丑陋、五十岁左右的夫人说:‘如果这个贱妇在我们面前还支持这项判决,那么她是否应该得到这样一个宣判呢?哦,我相信不会。’”霍桑笔下的女人似乎觉得那个男人也过于“仁慈”。一个女人想,这个男人“最起码应该将烧红的铁块在(她)额头上烙个印”。另一位女人要求判白兰死罪。

霍桑将这些“上流社会的夫人”描写成“丑陋的家伙”,因此“嫉妒”白兰的美貌和高贵:白兰拒绝说出孩子的生父——一位牧师的名字。尽管那些女人雇佣白兰,是“看上了她娴熟的缝纫技艺”,然而她们仍然孤立她、折磨她^{[3]10}。

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女作家丁玲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前,曾写两篇颇有争议的小说。其中一篇是发表在《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写

一个被日军掳去做军妓的姑娘贞贞,当她一年后回到村里的时候,却倍遭自己的亲人和乡亲们的歧视——而在这些歧视的行列里,更多的是女性。“贞贞把脸收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却望见两颗狰狞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谁呢?为什么要做那么一副残酷的样子。”从一个侧面烘托那样一个蒙昧与野蛮的环境。做为同性,女人对女性的轻视,特别是涉及到与性有关的事件,女性对于当事者甚至是明显的受害者,抱着一种冷漠甚至是贬斥的态度,确很典型,也较为普遍。

三、改变“自然化”了的“合理性”

以上所进行的女性“负向自认”的类型分析,是在社会性别话语背景下的事实存在。这种事实存在是没有必要掩饰的,因为这种负向评价是整体性的男权社会使之然,它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就连作者菲利普·切斯勒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女人并非天外客。就女人受压迫这一点来说,我们同样适应了风行的厌女思想体系。我们之所以赞成这种思想,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为了提高自己与所有其他女人相比较的个人地位^{[3]12-13}。

但其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日益发展的性别伦理的合理性。恰恰相反,任何具有自觉意识的女性,总是在不断地质疑或冲击这种种滞后的“男尊女卑”的所谓合理性。《简·爱》中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身为庄园主,财大气粗、颐指气使,曾对女主人公说过:“我有权蔑视你!”他自认为在地位低下且其貌不扬的简·爱面前,有一种很“自然”的优越感。简·爱完全知晓傲慢的罗切斯特的用心所在,她坚决维护自己的尊严,反唇相讥道:“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自尊吗?不,我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正像你和我最终将通过坟墓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这番话强烈震撼了罗切斯特,使他对简·爱产生了由衷的敬佩^[6]。其实简·爱的自尊、自信是建立在准确而清晰地“自认”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对所谓“镜像”的某种反抗。请看她对罗切斯特的回应:“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自尊吗?”这里所说的“穷”、“不好看”都是事实,既对说话对象(罗切斯特)没有任何危害,也使罗切斯特看到了坦诚的力量(他的疯妻正因没有坦诚相告她自身的真

相,才酿成婚姻的苦果)。当强调精神上是平等的之后,用了一个比喻,“正像你和我最终将通过坟墓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这里的关键词是“坟墓”,说明人的生命的短暂性,也暗示了精神生命的永恒和精神“平等”的高贵。这些简短而有力、有感情魅力和语言色彩的“真话”,对于在身陷婚姻痛苦难以自拔的男主人公来说,无疑是沉疴良药、当头棒喝,也无疑是拂面清风。其受到“震撼”,产生“敬佩”也就在其中了。

毋庸置疑,社会存在的某种阶段性的合理性,实际上是由某种“惯习”掩盖下的社会存在的宏观上的不合理性。虽然惯习同样受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但它具有一定的惰性,即使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已经改变,惯习也不可能马上改变。即使今天的生产关系早已不是狩猎的生产方式了,即使今天的后工业时代,已经决定了广大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的不争事实,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某种滞后,女性的“负向自认”仍然发挥着阻碍女性自觉意识全面提升的负向作用。女性主义理论家李小江指出:“现在女人们不仅仅在社会上在经济上要自立,而且要在精神和思想上也真正地站起来,她们要用女人的眼睛透视世界。”^[7]这里的“女人的眼睛”,并不仅指对异性世界的颠覆或颠倒,而且要用穿越“镜像”的眼光,真正认识女性赖以生存的周边世界及女性自身。特别是后者,“自己要用理性的目光认识自己、穿透自己”,才是研究女性自觉性的目的。

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以女性的觉醒为标志的。在长期的社会性别格局中,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不仅来自社会的成见或刻板印象,对女性形象加以扭曲,就是女性主体自身,也在成为“自然化”了的自认中,对自我形象给予着负向评价。这种自我的负向评价,既归因于社会的成见或刻板印象,也归因于在这种种成见与刻板印象中,女性自身的不觉悟与对自我性别的错误推导。在现代社会,日益开明进步的今天,部分女性自觉性的提高,并不代表所有女性自觉性的提高;对于广大女性及其以“公平、公正”为理想的整个社会来说,女性的真正解放,不仅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也需要自身自觉性全面提高的支持。这是女性获得全面解放的必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 沈奕斐. 被建构的女性[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2] 陈乐,唐毅红. 性社会学[M]. 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07:46.
- [3] [美]菲利斯·切斯勒. 女性的负面[M]. 汪洪友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4] [法]让·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65.
- [5] 牧之. 女性心理枕边书[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72.
- [6] 檀明山. 女人最容易犯的 100 个错误[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247.
- [7] 钞秋玲. 女大学生心理教育与自身发展[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173.

The Typical Analysis about Female's Negative Self – Identity

SONG Xin-ju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prejudices and inflexible impression, and women's "negative self – identity", which are truly believed as a paradox in the way of women's liberation. Women's negative self – identity includes these two big types that are "original model" and "assisted model", the latter has more academic value about the female ego psychology compensation. Change these kinds of negative self – identity for women's liberation and growth, needs the whole society participation, also needs women's self – efforts. Female self – consciousness is the necessary way of women complete liberation.

Keywords: women; negative self – identity; original model; assisted model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李 军)